

“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

——五四以来“人学”文论观念的双重维度及其辩证发展

赖大仁 张园园

摘要 现代“人学”文论观念是五四以来中国文论的自觉建构，其内部存在着“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两个基本维度。“人的文学”重视表现个人生活情感，追求个体自由解放和个性发展；“人民文学”则重视反映人民生活，服务人民大众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二者构成辩证统一关系。考察百年来我国“人学”文论观念的历史嬗变，涉及几个主要理论命题：“人的文学”是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旨在唤起人的觉醒，走向追求个性和情感解放；“人民文学”体现了为人民大众的文学方向，旨在让文学在人民革命事业中充分发挥作用；“文学是人学”旨在张扬主体精神及其文学自觉，把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强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从历史实践来看，“人学”观念始终存在着双重维度之间的张力互动关系，因时代条件变化其双重维度不断进行调整，从而达到某种新的平衡状态。新时代“人学”文论观念的总体发展趋向，必然要求走向两个维度之间的双重变奏和辩证发展。

关键词 “人学”文论观念 人的文学 人民文学 双重维度 辩证发展

作者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江西南昌 330022）；张园园，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江西南昌 330022）。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01-0172-11

在我国百年来文学理论现代转型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多种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理论观念系统，其中之一是被称为“人学”的文学理论观念系统。具体而言，涉及“人的文学”“文学是人学”和“人民文学”等理论命题。过去学界对这些理论多有探讨，但往往把它们作为各自独立的命题进行研究阐释，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来看，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包含两个维度的辩证关系：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从人学观点看文学，它是根源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现实，反映人的生活命运和心灵情感，表现人生并且指导人生，作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使人更加合乎人性地生活。在我国文学史上不乏各种人生论或人本论的文学观念，而作为一种现代“人学”文论观念，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论的自觉建构。由于受到中外各种不同理论资源影响，以及我国社会变革发展和文化语境的制约，这种现代“人学”文论观念的建构与嬗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现代“人学”文论观念内部，存在着“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两个基本维度：前者重视表现个人生活情感，追求个体的自由解放和个性发展；后者重视反映人民生活，服务人民大众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在中国社会现代变革发展进程中，这两个维度的文论观念既相互呼应又不无矛盾冲突，构成彼此之间的张力互动关系。其合理发展趋向应当是走向彼此融合的辩证发展。

一、“人的文学”：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人的文学”首先是一种启蒙话语，它在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浪潮中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批判性，即全面批判和推倒旧文学；另一个是建设性，即呼唤建设新文学，以此推进社会现代变革和国民精神的再造，其中又包括语言形式和文学内容变革两个方面。1935年胡适曾对新文学运动总结分析说：“简单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他把周作人《人的文学》称为“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①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追溯了欧洲关于“人”的发现历程，引入了西方人道主义的人学观点，并且阐述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在这种“人道主义”人学思想的基础上，他阐述了关于“人的文学”的理论观念，即“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又特别强调说：“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便是自主与互爱为内涵的新道德。^②以此为标准，他进一步区分和阐释了“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之间的根本区别，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根本区别。

《人的文学》一文发表可谓恰逢其时，就其思想观念而言，并不只是周作人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文学界许多人的共识。正如胡适所说，它是当时的一个“中心观念”，乃至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伟大宣言”。比如鲁迅文学观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人的文学”观念。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鲁迅用他的作品揭示了旧社会的“吃人”本质，发出了“救人”（特别是“救救孩子”）的呐喊，呼吁推翻那“吃人的筵席”，把人从旧社会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同时他提出了“立人”的主张，强调“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③鲁迅正是要用文学来批判和改造国民性，致力于唤起人的觉悟和改良人生。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④鲁迅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无疑就是那个时代“人的文学”的典范。

在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之前，胡适也在《易卜生主义》这篇长文中，通过评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来阐发“人的文学”观念。在他看来，易卜生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主张个人必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而“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看到了“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⑤因此，他主张中国新文学要学习易卜生，就要学习这种批判社会和张扬个性的精神。同一时期，傅斯年也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明确说道：“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

①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30、8页。

②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12月，第5卷第6号。

③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7页。

④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2页。

⑤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1918年6月“易卜生专号”。

文学，只为他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代替它，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以此为标准，他认为能引人感情、启人理性、使人发生感想的，能引人在心上起许多境界的，能化别人、使人忘了自己的，才是好文学，不然便不能算是文学。“任凭文学界中千头万绪，这主义，那主义，这一派，那一派，总是照着人化一条道路而行。如果有违背他的，便受天然的淘汰……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①这里所谓“人化”的文学，也就是“人的文学”的意思。

五四后出现了不少文学社团，纷纷发表各自的文学宣言，实际上也都以不同方式回应“人的文学”的中心观念。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由周作人起草发表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②这一派的作家共同坚守“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念，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生并指导人生，这与鲁迅始终倡导的文学“为人生”观念遥相呼应。1921年6月成立的创造社，主要受欧洲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明确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然而实际上，他们的核心文学观念是强调个性解放和追求个人生命情感的表现。郭沫若作为其中的核心人物，最充分地表现出这种文学精神，他强调诗“是人格的表现，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人是追求个性的完全发展的。个性发展得比较完全的诗人，表示他的个性愈彻底，便愈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因而可以说：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③他《女神》集里那些情感奔涌狂放的诗作，把这种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还有其他文学社团和作家个体，也都以各自的话语方式与创作追求表现了对“人的文学”观念的普遍认同。

总的来看，在五四前后启蒙主义的时代氛围中，“人的文学”成为文学界一种普遍观念。作为一种启蒙话语，它一方面表现为对于“人”的重新认识，即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合乎人性的人？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文学”的重新理解，即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真正有意义价值的文学？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命题，就是文学应当表现和改良人生，唤起人的觉醒和促进人的解放。当然，这个时期所着重关注的人和人生，都主要是指个体的、个性化的人。这是由于过去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强调个人服从社会群体，忽视个体权利和压制个性发展，人被奴性道德严重束缚，导致人的个性压抑和人性扭曲。因此，现代社会变革首先要从解放个体、个性和人性开始，所谓启蒙的意义正在于此。而“人的文学”作为新文学启蒙的标志，其时代意义不言而喻。然而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思想启蒙最终必然要走向民主革命实践，因为只有通过群体性的人民民主革命，才有可能打破和改变现存制度及其现实关系，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因此，“文学革命”之后的新文学便随着民主革命运动高涨而向“革命文学”转型，“人的文学”思潮也随之发生分化，多数人逐渐转向文艺大众化运动，然后融入“人民文学”的主潮之中；少数人仍然坚持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学立场，但它毕竟远离时代潮流而逐渐被边缘化，“人的文学”观念逐渐归于沉寂。这种走向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其中也仍有值得进行历史反思的方面。

二、“人民文学”：为人民大众的文学方向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时代主题是思想启蒙，重心在于批判旧社会、旧文化传统对人性的压抑，批判和改造国民奴隶性，从而唤起人的觉醒走向追求个性和情感解放，那么，这一切最终都要落到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改变社会制度和现实关系上来，这就必然要走向人民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

①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25—226页。

② 《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1号。

③ 郭沫若：《论诗三札》，《文艺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05—206页。

念呼应了当时思想启蒙的时代主题，而当群众的、阶级的民主革命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之时，“人民文学”观念便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人民文学”观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把文学纳入到群众的、阶级的民主革命进程中来，让文学在人民革命事业中充分发挥作用。

“人民文学”观念的系统化理论建构，无疑是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讲话开宗明义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并且强调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讲话的回答很明确：“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讲话一方面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要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以及怎样为群众服务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当时艺术界的各种糊涂观念，包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艺观和抽象人性论，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等“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从文艺实践方面而言，讲话强调文艺家要转变思想观念，解决个人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①对于延安讲话所系统建构的“人民文学”观念，以及它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观照分析。

一方面是它与列宁文艺思想和苏联文艺观念的关系。很显然，延安讲话中所阐述的“人民文学”观念直接来自列宁的文艺思想。讲话在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时，直截了当地说：“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②毛泽东在引入这个话题之后“接着说”，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延安文艺界的实际情况进行阐发，形成了中国化的“人民文学”理论话语。列宁这个论断在当时俄国革命的背景下有明确的针对性，一方面是针对当时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所谓个人写作、自由写作之类的鼓吹，尖锐地批判和揭露了他们的伪善，指出他们的写作必然要依赖资产阶级富人们的钱袋，要满足上流社会的享乐趣味，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对党所领导的写作事业提出明确要求，即应当坚决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艺观，把写作事业纳入到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来，将为劳动人民服务和为革命事业服务统一起来。^③这通常被称为文艺的“党性原则”，成为当时乃至后来苏联文学艺术的根本指导思想。从这个理论来源可见，“人民文学”既是一个文学命题，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政治性和革命功利性，这一点在列宁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中都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列宁对于“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只是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提出来，而毛泽东延安讲话则对文艺为人民大众以及怎样为人民大众的问题，做出了完整和系统的理论阐述，真正把中国化的“人民文学”话语体系建构起来了。总体而言，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同时也融入了对于文学艺术特性和文艺创作规律的深入理解，是文学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机统一。

另一方面是它与传统文化观念以及五四新文学观念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崇尚抒情言志、吟咏性情等个人化表现的一面，也有推崇心忧天下、关怀民生等表现为济世情怀的一面。从孔子“兴观群怨”诗说，一直到梁启超以“新民”为目标的“群治”小说理论，都表现出对诗文“群”的特性与功能的重视，“惟歌生民病”也历来是中国文学面向普通民众和表现民生关怀的优良传统。五四时期提出“人的文学”进行讨论，这里的“人”既是指个体和个性化的人，同时也把群体性的平民大众推向了历史的前台。鲁迅以“立人”为目标，致力于批判“国民性”以促进国民灵魂的改造，认识到“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④在他心目中显然是以广大民众为对象的。周作人在阐述“人的文学”命题时，以树和森林的关系作为比喻来阐明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也是把个体人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3、877页。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③ 参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3页。

④ 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40页。

和平民大众都包括在内，他还进一步提出“平民文学”的命题来进行阐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后，茅盾等文学研究会同仁在他们所创办的刊物上围绕“民众文学”的话题进行专栏讨论，力图引导新文学关心下层民众的生活和促进民众的觉醒，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文学走向民间大众的普遍重视。上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随着“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特别是 1930 年“左联”成立以后，发动过几次规模甚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参与者各自依据不同理论资源进行论争，这一问题虽未得到完全解决与落实，但也部分实现了它的理念，推动了它的发展进程。^①总的来看，从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到后来的“文艺大众化”，都是目标方向相同的历史进程，即把历来面向上流社会文人雅士的文学推向平民大众。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启蒙特性，即推动文学走向民间大众，关怀民众的人生疾苦和唤起国民的人性觉醒；随着民主革命运动不断推进，它便逐渐转变为一种革命话语，目的在于启发教育民众参与革命斗争和实现社会解放。毛泽东延安讲话系统建构起来的“人民文学”观念，把上述启蒙精神和革命要求有机融合起来了，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从历史观点来看，“人民文学”观念的历史建构过程，以及它建构起来之后便很快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应当说是时代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这种“人民文学”观念与当时人民民主革命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因此它才能成为主导性文学观念，引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取得辉煌成就，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而另一方面，当这种文学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强势话语之后，在一定时代条件下也容易走向片面性发展，从而产生某些消极作用。这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是“人民文学”观念的强势地位，对“人的文学”观念形成很大的挤压，几乎没有给后者留下多少自由发展的空间。早在 1920 年代末，当“革命文学”成为新的时代话语之时，它便表现出相当的偏激性。如当时太阳社主将蒋光慈在阐述“革命文学”定义时，就认为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告别个人主义而走向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时代，因此“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②郭沫若等创造社诗人本来是极力主张个人情感表现和个性自由的，然而当他们转向“革命文学”之后便决然向过去告别，声称“我在这儿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一句话：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已过去了”。^③在这种形势下，凡是与这种阶级的、群众的文学观念不相符的，都要被批判和排斥。二是“人民文学”话语体系中本来包含的启蒙性和艺术性的因素，也逐渐被遮蔽和过滤掉了。如前所说，延安讲话中的“人民文学”思想，虽然主要是一种政治话语，但其中仍然包含着从五四新文学（特别是鲁迅）所传承下来的启蒙文学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对于文学艺术规律的充分尊重，其理论内涵应当说是比较丰富的。但在当时文艺界如周扬、冯雪峰等人过度政治化的阐释中，“人民文学”话语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便越来越强，导致其他方面的内涵被遮蔽。胡风对这种偏向有所警惕和不满，试图依据鲁迅文学精神对“文学与人民”等问题阐发见解，期望以此起到纠偏作用，然而却受到错误批判。1949 年后对于“人民文学”命题不断有新的阐释，但受极左思潮影响，它在过度阶级化、政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极端片面性越来越突出，把“人的文学”观念维度差不多完全遮蔽了。然而物极必反，在历史发展的辩证运动中，必然还会出现此消彼长的不断反复。

三、“文学是人学”：张扬主体精神的文学自觉

新中国成立之际，《人民文学》同时创刊，毛泽东主席欣然为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文学刊物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这似乎是一种标志和象征，即当代文学将继续沿着延安讲话所指引的“人民

① 参见徐秀慧：《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旅行（1925—1937）——以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文艺大众化”的论述为例》，《现代中文学刊》2013 年第 2 期。

②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1928 年第 2 期。

③ 郭沫若：《文艺家的觉悟》，《文艺论集续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第 27 页。

文学”方向前进，这应当说是势所必然。然而问题在于，“人的文学”维度是否也应当获得应有的地位和生长空间？这个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被提出来并引起热烈讨论。

1957年5月，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依据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的建议，明确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命题，并具体阐述了文学必须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的基本观点。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大致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方面，应当说是受到苏联文艺界和美学界关于艺术本质问题论争的影响。1950年代中期，苏联文艺界围绕艺术本质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波斯彼洛夫等人属于正统派，他们秉承此前占主流地位的季莫菲耶夫文艺理论，坚持艺术的“意识形态论”观点，认为艺术本质上是对生活的认识与概括，或者说是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本质性特点的反映；艺术虽然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作，但它的基本任务却是意识形态性质的。与季莫菲耶夫不同的是，波斯彼洛夫在阐述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时，用“社会倾向性”或“思想倾向性”概念，取代了前者的艺术“阶级性”和“党性”的概念。而被正统派称之为“审美学派”的布罗夫等人，则试图突破和超越传统文艺观念的局限，突出艺术反映“人的生活”的特殊性。在他们看来，仅仅强调艺术反映社会生活是不够的，还应当看到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殊对象，这个特殊对象就是人的生活，因此，艺术所揭示出来的、构成艺术的思想内容的乃是人的本质。他们所说的“人”首先指的是个人，即具有鲜明性格的活生生的人，当然，这样的人与“社会的人”并不矛盾。而所谓“人的本质”，其实质就是“人道主义”，内涵就是对人的爱，这是艺术存在的条件和生命活水，艺术中如果没有人道主义是不可想象的。^①在钱谷融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明显不赞成季莫菲耶夫的理论观点，而是更多接受了布罗夫等人的文艺观念。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国内的文艺发展形势。1956年4月，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在这个背景下，文艺界空前活跃，文艺创作纷纷寻求各种突破和创新之路，文艺理论也亟需理论观念上的新突破，钱谷融提出“文学是人学”命题进行讨论，正可谓恰逢其时。

其实，钱谷融的文章理论上并不深奥，他一方面针对季莫菲耶夫的理论观点进行辩驳，明确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认为他这样理解文学的任务是违反文学的性质、特点的。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用所谓“整体的现实”“生活的本质规律”等把活生生的人和人的生活淹没掉了，这样不仅写不出真正的人和生活，还会使作品流于概念化。另一方面，他借引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的说法加以发挥，认为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从文学反映生活的本质特点而言，它的对象、题材等都应该人，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以人为中心才能揭示生活的本质；从文学的目标任务而言，就是要影响人、教育人，鼓舞人们去改造现实、改造世界，使人们生活得更好。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应当强调文学以人为中心。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斩断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或者取消文学反映生活的职能，而是说不能颠倒了文学描写人与反映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人和人的生活本来是无法割裂的，但这中间有主从之分，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和社会现实。除非作家写不出真正的人来，假如写出了真正的人，就必然写出了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和当时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如果反过来，把反映社会现实和揭示生活本质作为文学创作的目标，那就不但写不出真正的人来，所反映的现实也将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所谓生活本质也很难揭示出来。说到底，如果抽掉了文学写人这个核心，也就必然要扼杀文学的生命。^②

钱谷融的文章，无论是对季莫菲耶夫观点的辩驳，还是对高尔基观点的阐释发挥，明面上看是在讨论

^① 参见曹谦：《苏联“审美学派”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的转型》，《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2期。

^②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苏联引入的文学话题，然而实际上应当是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现实及理论观念问题。如前所说，1950年代我国的文艺理论观念主要是延安讲话传承下来的“人民文学”观念，以及苏联正统派的意识形态论文艺观念，这两者之间显然是比较合拍的。其共同之处在于，都特别强调文艺反映社会生活和文艺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而对于文学表现个性和人性人情等则并不重视，甚至是持批评态度。从“人民文学”观念而言，本来并不排斥写人的生活，但它所重视的是群体性、整体性的人民大众的生活，尤其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生活，而作为个人的生活情感和人性人情等，则在这种整体性生活中被淹没了。钱谷融的文章无非是想把被整体性生活所淹没的个人生活情感凸显出来，把当作反映现实的工具和手段的人复归到主体地位，把描写人作为文学的出发点和中心。从根本上来说，他接过高尔基的说法主张“文学是人学”，应当说并不否定文学反映人民大众的整体性生活，只不过认为要从描写活生生的个人生活出发，通过写出有血有肉和情感丰富的人，才能真正写出人民生活的本质特点。如果说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文学着重反映阶级斗争生活和强化意识形态功能具有历史合理性，那么在走出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之后，社会生活更应当以人为本，文学也应当更多向“人的文学”回归，实现文学作为“人学”的辩证发展。钱谷融以及同一时期讨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①应当说反映了当时文艺界的普遍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然而时过不久却风向突变，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受到激烈批判而被强压下去，失去了一次深入讨论和辩证发展的机会，从此极左文艺思潮泛滥成灾，历史教训十分深刻。

时隔二十余年之后，在新时期初思想解放的背景下，文艺界拨乱反正，“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命题被重新提出来讨论。1980年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②虽是旧话重说，对当年的主要理论观点再次进行阐发，却仍然引起文艺界的强烈共鸣和热烈讨论，随之引发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激烈争论，形成了新时期初文艺界关于“人学”探讨的理论热潮。正如有学者所说，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人的解放，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对“人”的重新发现，而“这里的‘人’主要是‘国家集体的人’后面的‘个人’，是那个包含了‘人’的全部丰富性的‘个我’，甚至不排除有欲望、私心、缺点的那个‘小我’。前30年高扬‘国家集体主义’时，‘个我’和‘小我’不同程度地被遮蔽，甚至成为批评和否定的对象；然而，新时期以来，这个包括了‘个我’和‘小我’的社会个人话语开始走上前台，被赋予了合理性、合法性地位。”从文学研究而言，就表现为将“社会个人话语”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重要表达方式。^③应当说，1980年代对于“文学是人学”话题的重新讨论，正是基于这种对“人”的重新发现和对于人的自由解放的追求，同时也是着重在“社会个人话语”层面上展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的自觉。

比较而言，1950年代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讨论，主要在于反对把描写人当作反映现实的工具和手段，主张文学应当从人出发和以人中心，以及倡导文学描写人性和人情，用真挚的情感表现去影响和教育人；而1980年代对“文学是人学”的重新讨论，以及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其意义内涵则显然有一个历史性的深化与提升。具体而言，一方面是更加凸显了对于人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反思。从反右到文革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得不正常的社会关系以及某些人的丑恶和人性异化充分暴露，人所应有的人格尊严被无情践踏，无论施虐者还是被虐者都已经人不成其为人。作为“人学”的文学，必须呼唤对这种社会关系与人的异化现象的真实反映和批判反思，才能恢复对于人的正常认识和实现人性的复归。另一方面，则是站在新时期的新启蒙立场，重新认识人之为人的意义价值，热切呼唤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关

① 这一时期此类文章还有：巴人《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王淑明《论人情与人性》，《新港》1957年第7期，等等。

②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③ 张福贵：《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怀。既然文学是人学，无论是理论观念还是文学实践，都理应张扬这样的人文精神。随着讨论不断深入，便推进到文学主体性的讨论，把人的主体地位问题凸显出来了。按照这种观点，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活动，不只是一要从人出发和以人中心，而是要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又表现为实践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在文学活动中更主要是追求精神主体性的实现。^①提出文学主体性问题进行讨论，其意义在于恢复文学中失落了的人的主体地位，反对文学中的“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倾向，反对把人当对象客体和服务工具，张扬人的主体精神，真正向“人本主义”复归。这就标志着新时期文学观念从“人”的意识觉醒，推进到了“人的主体”意识的强化，从而把“人的文学”理论观念嬗变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当然，在上述历史进程中，也出现了某些矫枉过正的偏向，即对革命文学传统和人民文学方向的怀疑和贬抑，包括对延安讲话精神的质疑和否定，这就走向了另一种极端片面性，这同样需要引起反思和纠偏。作为新时期具有现代理性精神的文艺理论，特别是作为主导性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应对此做出回应和进行新的文学理论观念建构。

四、新时代“人学”文论观念的辩证发展

站在新时代的理论基点上，基于上述对我国近百年来“人学”文论观念嬗变的历史考察，按照理论逻辑与历史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我们可以进一步做些理论反思和辩证分析，来探究新时代“人学”文论观念的辩证发展问题。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以及文学观念来看，人的解放和“文学是人学”本来都是辩证命题，从后者而言，内在地包含着“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两个维度，形成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在上述理论命题中，人学是文学的基础，我们先从人学说起。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整体与集体、个人与人民、每个人与一切人的辩证统一。马克思认为，个人存在及其生命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天然具有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特性，应当充分肯定和尊重人的个性发展权利，反对限制和束缚人的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则又指出个人不可能脱离集体（社会）而独立生存发展，实际上要受到社会现实关系的制约。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等复杂因素的作用，人的个性和自由等必然受到限制，甚至造成人的扭曲和异化，因此就必然要求改变这种社会现实而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然而每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都不可能单独实现，必须依赖多数人乃至一切人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展望未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或者说，未来社会将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③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观念便从属于这种人学思想，一方面看到文学家的个人创造性及其追求个体自由解放的意义价值，另一方面也将这种文学功能纳入到人民解放和一切人的解放事业之中来观照和阐释。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④其中就应当包含如上所述的丰富内涵。到了列宁时代，恰好处于俄国人民革命高涨时期，便理所当然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包括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作为首要任务，但他同时强调，要尊重艺术规律和个人创作自由，“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⑤其实，在列宁文艺思想中，同样内在地包含着两个维度的辩证关系，问题只在于两者位置如何恰当摆放而

①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83页。

④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90页。

⑤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选集》第1卷，第664页。

已,对此应当不难理解。

其次,从历史实践来看,无论人学还是文学命题,始终存在着双重维度之间某种内在的“张力”关系。这具体表现为,在历史实践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条件下,个体解放与人民解放、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经常会有一个孰先孰后、孰主孰从、孰重孰轻的问题,形成一定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冲突;而当一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要求进行调整,从而达到某种新的平衡状态。

如前所说,在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时代,显然是把为人民解放服务的党性原则放在首位,个人创作自由应当自觉服从这个大局。而当这种历史实践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就有可能将特定时代的文学原则上升为文学的普遍原则,从而造成对人学与文学的另一个维度的遮蔽,以季莫菲耶夫为代表的正统派文学理论正是如此。因而到了1950年代苏联“解冻”时期,就会出现审美学派要求解放人和复归人道主义的文学主张,以求克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过于压抑人性和个性的弊端,达到一种历史性的平衡。从我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实践看,20世纪初的“人的文学”观念,其实质在于适应唤起人的觉醒的现代启蒙要求,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变革或者说人民民主革命,首先需要从思想启蒙和唤醒个体的觉悟开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一切都无从谈起。当这种现代启蒙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人民民主革命以及革命文学形成一定的时代潮流时,以启蒙为底色的“人的文学”便逐渐转换或归附到“革命文学”或“人民文学”中来,这显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历史实践转换中,其实内在的矛盾“张力”也必然存在。从19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到1930年代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论争,再到1940年代延安时期的文艺论争(包括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不同观点的争论),都可以看出两种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然而这并不能改变“革命文学”或“人民文学”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趋势,因为这毕竟更符合当时人民民主解放的时代要求。到了1950年代的和平建设时期,加以受到当时苏联文学论争的影响,提出“文学是人学”命题,并且着重往“人的文学”维度进行阐发,同样具有历史必然性,反映了期望调整两个维度关系以达到新的平衡的新要求。然而遗憾的是错失了这次历史机遇,历史实践的惯性力量推动着单一维度的文学发展走到极致,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才重新接续这种历史纠偏运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某种历史性平衡。总的来看,在“人学”文论观念两个维度之间,始终存在着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张力”互动,这是人学以及文学作为辩证命题的内在辩证关系所决定的,上述历史实践的发展轨迹,不过是这种内在“张力”辩证运动的结果而已。

其三,从当代“人学”文论观念的总体发展趋向来看,必然要求走向两个维度之间的辩证发展。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观照和分析。

一是当代文论界的理论探索,不断走向学理逻辑的辩证统一。新时期初开始重新提出“文学是人学”命题进行讨论,既是对1950年代中断了的那场讨论以及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讨论的历史回应,也是在改革开放时代条件下一种新的理论探索和建构。经过一个阶段的多维度拓展,如1980年代着重讨论文学表现人性、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问题,到1990年代后着重讨论文学的新人文精神与新理性精神、文学人生论、文学心灵表现论、文学的人学本体论、文学人类学等问题,逐渐形成一些比较成熟稳定的理论观念,并进入到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系统性理论建构之中。有不少以“文学是人学”作为核心文学观念的著作和教材,试图从人的生成、存在与发展的理论基点、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来全面观照与阐释文学的人学本质与意义价值。^①在各种理论阐释当中,可以发现有不少都会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一方面看到人的个体生命及其审美实践活动的特性,从而阐明文学对于个体人生和个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意义价值;另一方面也看到人的生存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现实关系,从而阐明文学对于人的社会解放与自由发展的意义价值,并且努力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从“人学”的文学观念而言,也就是努力把“人

^① 参见赖大仁:《当代文学本质论观念嬗变的“人学”向度》,《中州学刊》2015年第3期。

的文学”与“人民文学”观念有机统一起来。如果说过去提出讨论“人的文学”命题，主要是基于对“革命文学”或“人民文学”的逆反与纠偏，那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则不断走向寻求学理逻辑上的辩证统一，这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

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与时俱进，其主导性的“人民文学”观念也更多把个体性文学表现的要求融合进来。按照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每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与一切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有机统一的，那么与此相适应的“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也应当是有机统一的。如果说过去革命年代“人民文学”处于优先地位，被赋予过于沉重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命，以致造成对“人的文学”的某种遮蔽，虽未必合理但也难以避免，那么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则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符合新的发展要求。正如有学者所说：“整体上看，‘社会个人话语’虽不及‘国家集体话语’来得崇高和宏大，但也具有基础和目的作用，也是进一步深化发展的结果。换言之，国家集体精神是以具体的社会的‘个人’为前提，国家集体主义也是以每个社会个人的发展和幸福为最后目的。‘国家集体’最初需要‘社会个人’作支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又需要突出‘社会个人’作用，彰显‘社会个人’价值旨归。”^①新时期以来，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论述为标志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显然一直坚持“人民文学”的主导性话语，但从具体阐释可以看出这种辩证发展的趋向。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主题仍然是文艺为人民服务，强调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同时他又重申列宁的说法，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他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②跟过去的“人民文学”观念有所不同，这里特别强调要充分重视文艺家个人的创造精神，而且把文艺反映人民生活和服务人民群众落实到了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各种各样的人，以及人的各种各样的文艺需求上，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贯穿在此后历代领导人的文艺论述中，只不过各有不同的表述。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阐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强调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把人民情怀具体落实到对每一个体的生命关怀上。对于文艺工作，他也反复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并且强调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真实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要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他又说：“社会的色彩有多么斑斓，文艺作品的色彩就应该有多么斑斓；社会的情境有多么丰富，文艺作品的情境就应该有多么丰富；社会的韵味有多么醇厚，文艺作品的韵味就应该有多么醇厚。”^③由此可以看出，如今的“人民文学”虽然仍是一种体现主导价值观的宏大话语，但它已经把“人的文学”的价值诉求融合进去了，充分体现了“人民文学”观念的辩证发展。联系文学实践来看，以路遥《平凡的世界》为代表的许多优秀文学作品，正是体现了这种个体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文学发展方向。

总之，我们的结论性看法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文学观点，可以说“人学”文论观念中内在地包

① 张福贵：《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②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0页。

③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含着“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双重维度，二者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双重维度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互动关系，不能简单化地把二者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似乎主张“人的文学”便要排斥“人民文学”，或者反过来，倡导“人民文学”就要否定“人的文学”。历史实践的辩证运动正在于不断调整双重维度的“张力”平衡关系，而新时代“人学”文论观念的总体发展趋向，也正在于走向彼此之间的双重变奏和辩证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 40 年文学理论问题论争研究与文献整理”（19AZW002）、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新时期文论四十年变革发展与理论反思”（18WX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曦）

Literature of Human and the People's Literature

—— The Double Dimensions and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Theory of Human Studies Since May 4th Movement

LAI Daren, ZHANG Yuanyuan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modern literary theory of human studies has been the self-consciou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re are two basic dimensions in the concept of human literature and people's Literature. The former pays attention to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 life emotion, pursues individual freedom liberation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he latter attaches importance to reflecting people's life and serving the people's free liberation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two constitute a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theory of human studies in recent 100 years, it mainly involves the following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Human literature is th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of pursuing personality liberation, arousing people's awakening to pursue personality and emotional liberation. People's literature embodies the direction of the people's literature, so that literature can play a full role in the people's revolutionary cause; Literature is the study of human beings, which aims at publicizing the subject spirit and its literary consciousness, and promoting the awakening and strengthening of human subject consciousness to a new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practice,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dimensions. Due to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the dual dimensions are constantly adjusted to achieve a new balance. In the new era,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theory of human studies inevitably requires the dual variation and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dimensions.

Key words: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theory of human studies, literature of human, people's literature, dual dimension, dialectical development